

大礼议是非新证:以明宗藩淮王袭位为例

王红成¹, 张之佐²

(1. 河西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甘肃 张掖 734000; 2.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祖训》“兄终弟及”是大礼议中的重要议题。从当时藩王爵位继承制度上说,张璁一方的讨论更加符合明代典制。以淮王爵位继承为例,康王嫡长子朱见濂未继爵而卒且无子,嫡次子朱见浚也未袭爵而卒。明孝宗下敕谕命朱见浚长子朱祐荣承袭爵位,且无须变更原有血缘身份。刘春擅改弘治间例,命朱祐荣称其伯父为父。但这次调整没有“著为例”。杨廷和一方效法刘春的非法先例,缺少制度层面的合法性。

关键词:大礼议;兄终弟及;明世宗;张璁;淮王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20)03-0079-06

大礼议的是非问题,是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明世宗入继大统的最直接法律依据是《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对此条文的合理解读是解开大礼议谜题的关键。目前学界普遍认同杨廷和一方的观点,批评张璁一方的立论“不足为式”,甚至斥为“无稽之谈”^[1-6]。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若张璁一方的观点果真是缺乏依凭的“无理取闹”,缘何被后人称作阳明先生的王守仁,在与席书、黄宗泽等张璁一方学者的书信往来中^[7],都透露了他赞同并支持他们观点的心迹呢?作为政权机构运行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祖训》为核心的朝廷典制是解开大礼议谜题最重要的钥匙,然而学界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对此却殊乏研究。本文拟选取明廷对淮王爵位继承的处理作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明代藩王爵位继承制度在实际的运作当中呈现的真实样态,从而在明代典制本身解开大礼议的是非难题。

一、以明孝宗为父,抑或以明武宗为父

在大礼议中,杨廷和一方把《祖训》“兄终弟及”中的“兄弟”解释为同产,此条文即指同父兄弟间的继承关系。明武宗去世之后,由于他没有子嗣,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迎立其亲堂弟朱厚熜(即明世宗)继任皇位。明世宗即位不久,命朝臣商议他的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这些人商讨过后,疏请世宗“为孝宗嗣,继孝宗统”^[8]。世宗问到他们的依据时,他们说是汉定

陶王、宋濮王故事,并声称“臣等愚昧,所执实不出此”^[9]。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杨廷和一方就没有再作详细的论证,要么在奏疏中不断重复“为人后者为之子,既为人后则不得复顾其私亲”^[10],要么就说“程颐之说有可据也”^{[10]105},然后再“仍以原拟册文封进”^{[10]422}。直到张璁等人上疏反对,这些人才有一些回应。不过,这时杨廷和一方的观点已有了一些调整,虽然他们仍把“兄终弟及”中的兄弟解释为同产,但他们的观点已经转变为要求世宗称武宗为父。户部尚书蒋冕说:“《春秋》书公孙婴齐,不曰公孙婴齐,而曰仲婴齐者,见婴齐以弟而后兄也。列国配臣尚明此义,况于有天下者乎?”^{[8]13a} 依循着他的逻辑,“仲”的含义类似于兄长,婴齐本来姓氏为公孙,《春秋》不称婴齐的本来姓氏而称为“仲”,就意味着婴齐用表示兄长含义的“仲”为氏,即称其兄为父。蒋冕抹掉了卿大夫与天子、诸侯礼制的差异,将卿大夫当行之礼作为明世宗称明武宗为父的证据。

但很不幸的是,《春秋》中公孙婴齐与仲婴齐并不是一人二氏,而是二人同名。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在《大礼纂要》中说得很明白:“鲁有二婴齐:一仲氏,一声伯也。成公十五年,书仲婴齐卒者,仲氏也;十七年,书公孙婴齐卒者,声伯也。苟为一人,胡既书卒而又书乎?《公羊传》乃曰公孙婴齐,‘谓之仲婴齐,为兄后也’‘为人后者为之子也’。”^{[8]13b} 鲁国有两个婴齐:

收稿日期:2020-03-25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明清时期甘肃书院与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9-GMD-042)

作者简介:王红成(198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史。

一个是仲氏,一个是声伯。《公羊传》误认声伯为仲氏,并附会仲字是为兄后之微言。席书对史实的考订是没有问题的:由《春秋》所记,仲婴齐与公孙婴齐的卒年差异来看,两人确实不是同一人^[11]。如此一来,也就印证了蒋冕征引史料的错误性,而建筑于此之上的观点也就无法成立。

不过,蒋冕的观点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被另一观点取代。礼部员外郎薛蕙说:“《祖训》之意在于辨嫡庶,非及为人后者也。”又说:“若先帝有次子,仍上考先帝,先帝本统不移,安用立后。”^{[10]1016} 这里说的“先帝”,是指孝宗而不是武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祖训》此条是指在同产的前提下,辨析同父皇子的嫡庶关系,所涵盖的范围只限于同父兄弟,而“弟”的意思是“朝廷亲弟”^{[10]1016},即同父亲弟,也即世宗。何孟春也说:“陛下之于孝宗,同姓而非异姓,同宗而非异宗也。孝宗有陛下为之子,则大宗之统不绝也;武宗有陛下为之弟,则大君之统不绝也。”^[12] 这里“兄弟”的含义是承自薛蕙的解释。与薛蕙相比,何孟春更明确地指出统嗣的归属,即孝宗传“大宗之统”(也即嗣),武宗传“大君之统”(也即统)。在他看来,世宗考孝宗,并与武宗为亲兄弟,便可以集统嗣于一身,而这种“两全其美”的抉择,不仅确保了孝宗一系的延续性,更明确了世宗皇位的合法性。

杨廷和一派的观点自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三年(1524)几经变更,但最终落在世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上,并不存在偶然性,而是他们难脱“前代故事之拘”“不忘孝宗之德”“避迎合之嫌”^[13]的必然结局。为此,他们不惜让武宗绝嗣,有嗣的孝宗“二嗣”,世宗孝心不得舒展,却依然坚持世宗考孝宗。从时间上看,何孟春上疏时间是嘉靖三年(1524)七月,此时大礼议已接近尾声,可以说是他们议礼观点的最终陈述。然而,从杨廷和到蒋冕再到何孟春,始终没能解决天子为人后礼的理据问题,纵是被清儒赞为“一语破的”^[14]的薛蕙也不外如是。他在《为人后解》中说:“大宗者,卿大夫之礼也。古者公子为卿大夫,及始仕而为大夫者,谓之别子;继别子者,谓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礼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绝,益知天子之不可绝矣。”^{[14]467} 此文旨在“推明大宗义”^{[9]5074}。薛蕙的论证理路与其他人一样,属于无理据的臆断。不管是《为人后解》还是《为人后辨》,几乎通篇在讨论卿大夫礼,而不曾谈及天子为人后礼的理据。其所以能够得出天子为人后礼,只是因为他

认为卿大夫之大宗不可绝,天子也不应当绝。但这样逆推的依据何在,他们却无法讲得清。

二、明代爵制中“兄终弟及”不专指同产

大礼议期间,杨廷和一方观点的转变不仅说明他们论礼不能慎始慎终,更是他们的观点难以弥缝的真实写照。与此相对的,张璁依据儒家经典尤其是《礼经》中“由嫡至庶、长至幼”的服制亲疏顺序,将“兄终弟及”解释为一种递进式的继承关系,即如他所说“《祖训》‘兄终弟及’,可推之无穷,而施由亲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谓伦序也,非专指同产言也”^{[8]8b}。不过,张璁一方的解释不仅是基于儒家经典尤其是《礼经》中的宗法原则,也是基于明太祖制定的律令规条,更是立足于明代基本制度的妥善考量。下面要讨论的明宗藩淮王袭爵议题,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以往学界关注得不多,尽管有学者注意到了它和大礼议的某些关联,并称之为“大礼议的正德朝预演”^[15],却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次事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刘春。他于正德八年至十年间(1513—1515)担任礼部尚书,其间更改了弘治定例,从而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任淮王是仁宗七庶子朱瞻墉,受封于永乐二十二(1424),薨于正统十一年(1446)。其爵位由他的嫡长子朱祁铨袭封,死后谥为康王。康王有嫡长子朱见濂,但朱见濂天子,且仅以世子身份卒,未袭封爵。又有次子朱见浚,封为清江王。康王年老时,“请以次子清江王见浚摄府事,逮王薨,见浚寻卒”^[16]。从康王疏请朱见浚“摄府事”来看,康王有意让朱见浚承袭爵位,只可惜“见浚寻卒”。而孝宗在弘治十七年(1504)命朱见浚长子朱祐棨袭爵的敕谕,当是在康王疏请基础上的决定。

及武宗即位,朱祐棨上疏奏请“以世子(朱见濂)人家庙奉祀”,礼部商议后,决定援据孝宗时“周王故事,追封入庙”^[17]。这里所说的“周王”,是指周惠王朱同鏊之子周悼王朱安潢。他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封为世子,但未及袭爵,便于隔年以世子身份去世。为此,孝宗特下诏书:“周悼王止是世子,故后追封王爵,比与亲王实封王爵不同,其子仍授本等官职。”^{[16]266} 朝廷追封某世子的爵位,仅有其名而已,与实授的爵位有本质差异,纵使他的亲子也只能以本职奉祀,不得承袭所追封的爵位。也正因如此,在追封朱见濂为淮安王之后,并没有要求朱祐棨以朱见濂为王考,而仍称其为伯父,称朱见浚为王考,并将之写进《玉牒》。这就为此伦序关系提供可靠的律法理据。

正德八年(1513),朱祐榮又上疏,称其“生在安王卒后,未尝为嗣”^{[16]344},请封其生父清江王朱见浚为亲王。朝廷命王府长史勘验此事,不久其上疏朝廷说:“安王伯父之称,本诸制词,惟称清江王为王考,于义未协。”^{[16]344}这里说的“制词”,是指由宗人府掌管的著录诸王生卒年、爵位等信息的《玉牒》。这其实是在强调,朱祐榮称朱见浚为伯父,不仅有先天的血缘宗亲基础,还有与之相当的制度保障。而唯一存在疑问的是他称朱见浚为王考,却也只是“于义未协”,而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这位长史又说:“按:礼,诸侯之子为天子后者,称于所后之天子,而不得称于所生之诸侯;别子之子为诸侯后者,称于所后之诸侯,而不得称于所生之别子。其不为人后者,子为天子而父非天子,则必追尊之诏已播于天下,乃可称其父为天子;子为诸侯而父非诸侯,则必追封之请已允于天子,乃敢称其父为诸侯。”^{[16]344}在讨论之前必须要清楚,朱祐榮与伯父朱见浚、生父朱见浚的关系已经确定,这次商议的问题不是三者的关系,而是朱见浚能否追封亲王。这段文字旨在辨析某人继承非生父爵位的类别:一是为人后者,二是不为人后者。如果某人继承天子或侯的爵位,且为人后者,那为人后者只能称所后者为父,而不能称本生父为父。如果某人继承天子或侯的爵位,“其不为人后者”,可以追封他的生父为天子或侯。这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追封生父为天子,必须待到“诏已播于天下,乃可称其父为天子”;如果追封生父为侯,必须“请已允于天子,乃敢称其父为诸侯”。

这两套方案并没有严格的划定标准,而是按照继爵者的个人意向,做出相应的取舍。这就决定了相关案例的处理极具灵活性,而不会有僵化、教条主义的出现,也为处理者与继爵者带来极大便利。按理来说,朱祐榮称朱见浚为伯父,这就承认了他与朱见浚的父子关系,为何却又说称其生父为王考有些问题呢?主要是因为朱祐榮没有依照朝廷法定程序,上疏请允于当朝天子。如果他依照法定程序上疏奏请,便能以原有血缘身份承袭淮王爵位,并追尊其生父为淮王,也与大明典制一致。这位长史紧接着又说:“今之亲王,即古诸侯也;今之郡王,即古别子也。亲王所主祭之王考,则诸侯之祫庙也。淮王既不后于其伯,则非为人后者,欲乞以清江王追封入庙,与安王同为三世之穆,似两得之。但,今未得请,王乃以亲王之爵主祭郡王之庙,祀号为王考,是即子为诸侯而父非诸侯,

请未允于天子,而辄称其父为诸侯矣;又生母赵氏未得进封,遽称国母,先居永寿宫,此则其非据者。”^{[16]344-345}这段话把诸侯和别子划定为不同的身份,而未将诸侯包含于别子之内,这就意味着他很清楚宗法制度的适用范围,即不上及天子、诸侯。这种辨析基本与儒家经典契合。某亲王祫庙中受祭者肯定是他的生父,而朱祐榮“既不后于其伯,则非为人后者”,所以请求他的生父朱见浚“追封入庙”,自然合情合理。再看“但”字引出的一句话。在这句话中,这位长史指出了朱祐榮的做法有不合情理之处:一是朱祐榮没有“请允于天子”,便称生父为亲王;二是朱祐榮生母未得到朝廷封旨,便以之为国母,入居永寿宫。这一整段话是在朱祐榮称朱见浚为王考合乎礼法的前提下讲出的,表面上似乎在批评朱祐榮没有依循朝廷律例办事,实际上是在申述朱祐榮奏请的法理依据。另据“国朝定制,亲王无子,以伦序相当之侄,袭封王爵,止于主丧、理国事、奉祭祀,仍父本生郡王”^{[8]13a-13b}。将之与前面两段话对勘,可见这位长史说的与“国朝定制”若合符契。不得不说,这位长史对朝廷典制有相当程度的把握,所言字字珠玑,足以说服世人。

但朝廷新任礼部尚书刘春却给出了与此绝异的决定。他说:“安王虽未封而卒,今已追封为王。祐榮虽生于安王卒后,今既入继亲王,则实承安王后矣。皆朝廷之命,非无所承也。乃更欲追封其本生之父,则安王封谥之命将安委乎?徒欲顾其私亲,而不知继嗣之重,事体殊戾。况安王既追封入庙,为三世之穆,清江王又欲进封则一代二穆,岂礼哉?祝号称呼,不可以制册为据。惟当以所后为称,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樸主之,惟王无预焉。所居官则安王妃迁入永寿宫,清江王妃退居清江府,斯礼典法令皆得矣。”^{[16]344}他一反此前诏命,要求朱祐榮必须入嗣淮安王朱见濂,不得追封生父清江王朱见浚。刘春给出的理由是,朱见濂生前虽未袭封,此时却已经追封为淮安王,“祐榮虽生于安王卒后,今既入继亲王,则实承安王后矣”。言外之意,如果朱见濂没有追封为王,那还有商讨的余地。如今已追封为王,便与实授相同,朱祐榮要继承王位,就必须入嗣为后。当时朝廷接受了刘春的意见,命朱祐榮入嗣朱见濂为后。

朱祐榮承袭爵位之年是正德元年(1506),距刘春为礼部尚书之年即正德八年(1513),还有八年之久。这期间朝廷承认朱祐榮“继统不继嗣”的做法是合法

行为,对他不为朱见濂之后也是持肯定态度。直至刘春出任礼部尚书,“继统不继嗣”的观点才被认定为与朝廷礼制相背。此事在《明史》中也有记载:“(正德)八年(1513)代傅珪为礼部尚书。淮王祐桢、郑王祐樸皆由旁支袭封,而祐桢称其本生为考,祐樸并欲追封入庙。交城王秉机由镇国将军嗣爵,而进其妹为县主。春皆据礼驳之,遂著为例。”^{[9]4886} 这句话的本意是在夸赞刘春“据经考礼”的行为,同时也交代了另外一件事,即“继统即继嗣”的说法是从此时才确立的。也就是说,“统嗣合一”的观点始于刘春出任礼部尚书之时,不是明初便存在的祖制。至嘉靖四年(1525),事情发生了改观。此年,淮安王妃因朱祐桢卒,奏请以朱祐桢次弟朱祐樸继位淮王。事下礼部议,“据《玉牒》,祐樸为淮康王次孙、安王次侄、清江端裕王次子、今薨淮王次弟,伦序宜及”“令祐樸管理府事”^{[10]1210}。嘉靖八年(1529),淮王朱祐樸奏请“追封其父清江端裕王见浚为淮王,母妃赵氏为淮王妃,许之”^{[10]2376}。至此,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三、明代制度层面的观察

淮王爵位继承关系的处理,与大礼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刘春所说“今既入继亲王,则实承安王后”“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樸主之”,与杨廷和等人在大礼议中“皇上入继大统”“宜称孝宗为皇考”“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兴王,主祀事”,以及双方强调“继嗣之重”“不得复顾其私亲”等,在遣词用字上有极相似处,不能不令人怀疑两者之间的关联。两者这般相似,主要是由于杨廷和与刘春私交甚深。两人都是四川人,有同乡之谊。更重要的是杨廷和曾想要拉刘春为援助,并力推刘春“理东阁诰敕”。为此,武宗还以杨廷和“私其乡人,切责之。廷和谢罪,乞罢,不许”^{[9]5033}。这就说明两人在政治上是近乎“盟友”的关系,否则也不会拉拢对方作为己助。不仅如此,杨廷和还专门为他赋一首诗名为《赠刘春刘台》,赞誉他说:“君家兄弟好文章,经学渊源有义方。夺锦两刊乡试录,凌云双立解元坊。大苏气节古来少,小宋才名天下香。从此圣朝添故事,巴山草木也生光。”^[18]这些都说明两人绝非一般性质的同僚关系,更是非常亲切的僚友。杨廷和如此推崇刘春的经学,那刘春在正德八年(1513)所上的奏疏,个中详情杨廷和必定知晓。如此,便很好理解为何杨廷和等人处理大礼议,与刘春处理淮王爵位继承关系,几乎如出一辙了。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杨廷和等人对大

礼议的处理,实际是对刘春对淮王爵位处理的依循。

循着这个逻辑,朱祐桢乃至世宗维持原有的血缘身份是否合乎礼法,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春的意见是否“著为例”。从律例角度讲,如果他的意见确实“著为例”,即使刘春的处理办法是违犯法度的,那在新例出现之前朝廷必须要以此例为准。杨廷和等人要求世宗入考孝宗或武宗,便是依例行事,自然合乎朝廷典制。但关键是他的意见没成为朝廷新例。据现有的史料,除了《明史·刘春传》之外,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这一情况,相反一些文献中却有它的反面例证,如嘉靖元年(1522)对秦郡王爵位继承关系的处理。成化十一年(1475),秦保安庄简王朱公炼去世,郡王爵位由其嫡长子朱诚潢继承,而朱诚潢薨于弘治八年(1495),且无子嗣。郡王爵位由其弟朱诚淶承袭,但朱诚淶又在弘治十四年(1501)去世,也无子嗣,以致爵位再传至其弟朱诚激。及朱诚激去世后,其子朱秉棧于嘉靖元年(1522)上疏,请袭王爵。如果刘春的意见被定为新例,那礼部所援引的应在此例,但实际上礼部引据的却是正德五年(1510)“武宗皇帝圣旨:封爵重事,今后郡王无庶子,止许亲支以本职奉祀,不许冒请袭封”,拒绝了朱秉棧的疏请,并言责“该府辅导官不能以礼谏阻,请治罪如例”^{[10]416}。这里所说的“治罪如例”之例,也不是当时新例,而是重申弘治时藩王袭爵旧例^{[17]258}。也就是说,这两起宗藩袭爵案例的处理,都是依循弘治旧例,而刘春的意见没有“著为例”,不具备普遍的法律效力。

此外,从丘濬的话中也可以得到些许印证。他说:“我朝亲藩初封,未有继别之子,而国绝则不为立继,盖古礼也。”又举《大明令》“无子立嗣”条,指出此中律文“皆谓其人生前立嗣也,无有死后追立之文”^[19]。据丘濬的解读,大明律法中藩王若无嫡庶子,所选立的爵位后继者,须是某王生前指定,而没有待其死后追立某人为其后的情况。若以此类推,便可知张璁所谓“孝宗宾天之日,我皇上犹未之诞生也,是孝宗固未尝以后托也;武宗宾天之日,我皇上在潜邸也,是武宗又未尝托为谁后也”^[20]是朝廷典制层面的理据。换句话说,世宗入继大统,则须维持孝宗之侄、武宗堂弟、兴献王之子的身份,而不能追立世宗为孝宗或武宗之后。

实际上,孝宗圣旨讲得很清楚,某世子追封的爵位与实际授予的爵位绝不相同,两者最大的差异就是前者不可被亲生子嗣继承,且其本人也不可进入祖

庙,而后者却是可以的。既然追封的爵位连亲生子嗣都不能继承,那更不会出现过继从子为后的情况。也就是说,据弘治故事,朝廷即使追封朱见濂为王,相对于实授而言,也只是虚爵而不附带子嗣袭爵和本人入庙等相关权利。但要提一点,绝不可以据“周王故事”逆推,某人爵位实授允许亲生子嗣承袭,便推出存在允许从子过继此人为子的情况。引“周王故事”要辨析的是能否入庙的问题,不是能否过继某人为子嗣的问题。况且,前面长史的话的讨论,已经知道当时存在为人后和不为人后的灵活选择,不存在教条式的过继原则;且辨析了朱祐棨称朱见濂为伯父,称朱见濂为王考,合乎大明律法。这层逻辑关系必须辨析清楚。

即使退一步讲,若仅在淮王爵位的处理上说,刘春的意见并没有切实地解决问题,反倒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朱见濂虽是嫡长子,却没有继承爵位而去世,嫡次子朱见浚早被封为清江王。淮康王去世,必然带来爵位的空缺。如果朱见濂未卒,而朱祐棨和朱祐樛又是清江王之子,依照明代典制,朱祐棨是清江王的直接继承人,朱祐樛则需要外封为镇国将军。但

如今朱见濂去世,这时只要依照《祖训》中“兄终弟及”条文,要求朱见浚继承便可。而朱见浚未继承爵位而卒,爵位继承权自然由淮康王的嫡长孙、朱见浚的嫡长子继承。这是很自然的继承关系,完全没必要如刘春那样节外生枝。如果依照刘春的意见,则与宗法制度相违背。依照“统嗣合一”的逻辑,宗法中大宗绝嗣,小宗有承重的义务,且选取小宗中某个庶子继承大宗宗子之位,而小宗嫡长子以外的嫡子则不可以承重大宗。不过,宗法原则也不是如此绝对,在大宗绝嗣而小宗无庶子的情况下,小宗嫡子才可以承重大宗。这样的话,承袭淮王爵位的应是次子朱祐樛,不是长子朱祐棨,而刘春的意见也就无法成立。所以说,这个案例的处理不能看作刘春个人的失败,更是体现了解“兄终弟及”为同产与朝廷典制、宗法原则无法调和的矛盾。不仅是刘春也包括依循其观点的杨廷和,其所坚持的观点是很难说服天下人的。但杨廷和一方在处理世宗与孝宗及生父兴献王之间关系时,却置朝廷典制于不顾,而遵用不具普遍法律效力的刘春的案例,这都足以说明杨廷和一方的议礼观点都无法从逻辑上讲得通。

参考文献:

- [1] 张寿安. 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0-152、223.
- [2] 张显清. 明代政治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34-335.
- [3] 尤淑君. 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仪与嘉靖政治文化[M].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6:123-124.
- [4] 刘真武. “大礼之争”是非考辨[J]. 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67-69.
- [5] 赵克生. 明世宗祭祀改制对嘉靖政治、经济的影响[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52-57.
- [6] 王剑,王子初. 学理之异与议礼之争:嘉靖朝大礼仪新论[J]. 求是学刊,2017(2):165-171.
- [7] 任文利. 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09-123.
- [8] 杨一清. 明伦大典[M]. 美国国会藏嘉靖间司礼监刊本:8b.
- [9]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059.
- [10] 徐阶. 明世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82.
- [11] 李衡眉,张世响. 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J]. 史学集刊,2000(4):81-82.
- [12] 何孟春. 何文简奏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39.
- [13] 霍韬. 渭厓文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9.
- [14] 秦蕙田. 五礼通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61.
- [15] 陈旭.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仪”之关系述论[J]. 贵州社会科学,2015(3):67.
- [16] 俞汝楫. 礼部志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44.
- [17] 杨廷和,蒋冕. 明武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37.
- [18] 黄廷桂. 四川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82.
- [19] 丘潜. 大学衍义补[M]. 林冠群,周济夫,校点.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459.
- [20] 张璁. 张璁集[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2.

The New Evidence of Right and Wrong in the Grand Ceremony:

Tak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King of the Vassal Stat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WANG Hongcheng¹, ZHANG Zhizuo²

(1.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 Ancestor's Instruc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elder brother, the succession of the younger brother to the throne w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grand ceremon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uccession system, Zhang Cong's discussion was in line with the Ming dynasty Canon system. Tak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title of Huai king as an example, Zhu Jianlian, the eldest son of King Kang's wife, did not succeed to the title and died childless, while the second son of his wife, Zhu Jiandian, died without inheriting the title either. Ming Xiaozong ordered Zhu Jiandian's eldest son Zhu Youqi to inherit the title, without changing his original blood identity. Liu Chun changed the rule of Hongzhi arbitrarily, ordering Zhu Youqi honor his uncle as his father. But this adjustment was not "documented as an example". Yang Tinghe and his party's imitation of Liu Chun's illegal precedents lacked legitimacy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Keywords: grand ceremony; the succession of the younger brother to the throne after the death of the elder brother ;Ming Shizong; Zhang Cong; Huai king

[责任编辑 夏 强]

(上接第 78 页)

参考文献:

- [1] 陈敏,余胜泉,杨现民,等. 泛在学习的内容个性化推荐模型设计:以“学习元”平台为例[J]. 现代教育技术,2011(6):13-18.
- [2]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数说新时代职业教育[EB/OL]. (2019-02-19)[2020-04-02]. http://m.jyb.cn/rmtzcg/xwy/wzxw/201902/t20190219_213865.html.
- [3] 王昕宇;李红超. 论广告定位策略[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2-35.
- [4] 李凯,严建援,林漳希. 信息系统领域内网络精准广告研究综述[J]. 南开管理评论,2015,18(2):148-149.
- [5] 王妍. 基于社交网络的精准广告投放策略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15.
- [6]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M]. 2版.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1.

Strategies for the Placement of Precise Advertising for Open Education Enrollment

XU Mengya

(School of Literature, Law, and Education, An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Taking open education enrollment advertis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open education enrollment, and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ecision advertising and the advantages of advertising,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for precise advertising for open education enrollment: highlighting the product positioning of learning advantages of open education, adopting the form of network publicity combined with ground promotion activities, using CTR and “secondary communication”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accurate publicity.

Keywords: open education; enrollment publicity; precise advertising

[责任编辑 夏 强]